

当前汉语通称缺位现象探微

匡 腊 英

(集美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 文章对汉语通称缺位现象进行考察与分析, 揭示社会文化在深层对语言的影响, 说明通称缺位不仅是| 种语言现象, 也与社会结构与传统等级观念有着密切联系。

[关键词] 通称; 缺位; 零称谓; 拟亲属称谓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0755(2009) 02- 0077- 02

世界上的语言交际无外乎两种: 与熟人(包括亲人)交际和与生人交际。在这两种交际中, 说话者选择何种称谓来称呼对方, 其可能性并不一致。在与熟人交际的过程中, 说话人了解对方的姓名、身份、职业、头衔、婚姻状况等, 可在众多称谓中选择最恰当的一种; 但是, 如果和生人交际, 对方的情况你一无所知, 此时就只能选择一个能适用于大多数人的“通称”来称呼。

相应地, 称谓语大致可分为两类: 亲属称谓和非亲属称谓(即社会称谓)。汉语称谓系统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对称, 称呼与己有关, 尤其是有血缘联系的亲戚时, 亲属称谓发达; 而在社会交际中, 非亲属称谓, 特别是通用称谓语(即通称)缺位。其结果就是: 当我们称呼熟人, 特别是亲人的时候, 有着众多选择。但如果碰到陌生人, 却往往不知如何称呼。

汉语语境下的社交称谓中, 通称的缺位, 特别是中性通称的缺位显而易见。对于沾亲带故的点头之交, 对于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尤其对于在电话或邮件中沟通却未曾谋面的人, 以什么称呼语作为开场白, 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无比为难的事情。从历史上来看, 解放前, “先生、太太、小姐”是最常用的通称; 解放后, 带有明显革命色彩的“同志”成为了大部分人乐于选择的通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同志”是我国称谓系统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通称; 最近三十年, 我们则陷入了通称缺位的窘境, “同志”具有的政治色彩、时代烙印使它在交际者之间形成不同的社会距离, 改革开放后失去了它一统天下的通称地位; “先生、太太、小姐”一方面似乎与旧时代相联系, 另一方面, 也更适合于知识分子阶层, 不具有通称性。如果需要问路, 遇见年轻的姑娘, 可以称呼“小姐”, 如果对方是四十多岁呢? 叫“小姐”似乎不够礼貌; 叫“大姐”或者“阿姨”, 对方可能因自己被“叫老”感到不快; 叫“同志”, 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不合适也显得老土; 叫“师

傅”, 只适用于体力劳动者, 而且通常是对男性的称谓……在这样的情形下, 不单是外国人一筹莫展, 中国人也感到为难。这种现象颇具中国特色, 在世界各国的语言中, 汉语有着最庞杂的称谓系统, 但在这一系统中, 我们居然常常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通称来称呼陌生人。

汉语通称缺位, 主要受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

(一) 很少和陌生人交际的传统农业社会导致了交际中通称的缺位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 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 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 以农为生的人, 世代定居是常态, 迁移是变态, 人口的流动性小, 触目皆是熟悉的人, 如费孝通先生所说, 这就形成了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们在语言交际中, 很少需要与陌生人打交道。语言称谓是在交际中产生的, 也与交际活动相适应, 这样的交际模式就使得千百年来, 汉语称谓系统在亲属称谓高度发达的同时, 缺乏非亲属称谓语, 更使得交际中普适度高的通称缺位。

最近一百多年来,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 人们的交际活动较之以往显著增多,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工业化程度提高, 城市化进程加快, 人们无论工作、学习还是生活, 都要和各种陌生人交往, 甚至无需出门, 电话或邮件里也产生了对陌生人的称谓问题。

因此, 不是传统社会里没有通称缺位的问题, 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这一问题被凸显和放大。当过去的熟人社会不再, 当我们身居高度陌生化的城市, 陌生人之间语言交际的频繁与通称的短缺产生了矛盾。过去在某种意义上被遮蔽的通称问题却成了现代人常常面对的尴尬。

(二) 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不是适宜汉语通称产生的土

[收稿日期] 2008- 12- 22

[作者简介] 匡腊英(1974-), 女, 湖南临澧人, 集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 上海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壤

通称的缺位作为一种交际现象,反映了社会文化在深层对语言的影响。对语言使用者来说,越是重要的现象与观念,使用者对它的语言分割就越细密。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至少七个不同的词来表述雪,因为他们生活在雪的世界里,区分雪的形态与状态对于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一些近赤道非洲国家的语言中却没有一个关于雪的词。另一个例证是:在阿拉伯语中有四百多个表述骆驼的词。然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常用的仅有一个(camel 骆驼)。骆驼是大多数讲阿拉伯语的民族重要的交通工具。这四百多个词表述了骆驼不同年龄、性别、品种、大小等等的名称,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同样,血缘与宗族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需要用不同的称呼来严格区分父系母系长幼尊卑等各种关系,而陌生人则无足轻重,导致了在汉语系统中缺乏基本的通称。

亲属称谓语在汉语中的高度发达,与我国传统社会重视血缘宗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外国人看来,中国的亲属称谓语十分繁琐。但正是这套繁琐的系统表现出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人际关系中的等差性。人和人的血缘不同,亲疏关系也就不同。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家庭亲属的亲疏、辈分、年龄代表着不同的地位、权利和义务,这种不同对汉族人如此重要,以致在语言上需要“专名”来区分,“名不正则言不顺”,重视名分的国人,绝不会将“七大姑”与“八大姨”混同。而公公婆婆和外公外婆,叔叔和舅舅,则区分了父系与母系的亲疏。这是汉语在亲属关系秩序之下,对家庭伦理的语言分割。通过区分细致的亲属称谓,等级与秩序被彰显。

语言与文化从来都是相生相伴的,中国文化中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不是适宜通称生长的土壤,因为通称对所有人都适用,彰显的是人际关系中的平等精神。

汉语之所以长期以来缺乏通称,是因为传统的宗法文化非常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尊卑等级,长幼次序,嫡庶分别,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里,“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强调的是礼教传统,对“礼”的服膺,对伦理的敬畏。传统的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几乎不会想到直接以通称来称呼,不过问对方的辈分、年龄、排行、职衔等就随便以一个通称来称呼人,则是没有教养的同义词。因为植根于错综复杂的家族网络中,国人正是凭借这网络中的位置,在人伦关系中,在不同的称谓中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对他人的认同。名分如此重要,而不同的称谓(而非千人一面的“通称”)正是对名分的确认。

所以,通称的缺位,与其说是汉语中没有通称的语言形式,还不如说是中国缺乏以同一眼光看待所有人的伦理观念。

二

在和陌生人进行言语交际的过程中,称谓语将起到打通会话渠道的作用,作为交际的基础,它所传递的不只是语言信号,也包括情感信息。通称缺位,往往使得交际在一开始就陷入尴尬境地,影响交际效果,这一问题对国人而言尤

其明显。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对策:

(一)因人而异,沿用已有的通称

解放后,社交通称不断兴起。第一次是上个世纪50年代“老乡”、“同志”的兴起。第二次变化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师傅”的流行。第三次则是在非教师阶层,特别是知识界、新闻界、体育界和传媒界中一度兴起称呼“老师”的热潮。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被大众普遍接受的通称目前看来仍然处于缺位状态。但是已出现过的通称,包括“先生”、“小姐”、“太太”等,都可以沿用。如果在社交礼仪场合,或者被称呼者是知识分子模样,年纪尚轻,不妨称呼“先生”或“小姐”;对于司机、维修工人等体力劳动者,可以尊称一声“师傅”;对于餐厅的工作人员,可以称呼“服务员”;在学校里向年轻学子或年长者问路可以分别称呼“同学”或者“老师”……

(二)遵循礼俗意识,使用拟亲属称谓

汉民族重视血缘宗亲关系的文化传统使得亲属称谓泛化,拟亲属称谓被广泛应用于人际交往,用来称呼陌生人,说话人用“套近乎”的方式表达亲近和尊重。在中国,孩子或成年人对于陌生的长辈都可使用拟亲属称谓以示尊敬,这样的处理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伦理和行为习惯,有亲和力,能够缩小交际双方的距离,收到良好的交际效果。

中国人重视人情,讲究内外有别,而“关系”是协调与和谐的关键,在人际交往中,在处理事情时,有没有关系,关系如何是大不一样的,因此远关系要拉成近关系,没有关系要找关系,不是关系要虚拟关系,正是这种文化心态决定了汉语拟亲属称谓的泛化。

在国人的伦理观念中,长幼有序、尊卑不同,初次和陌生人交往,虽然不了解辈分级别等,但年龄却是比较容易判别的。因此,对比自己年长的陌生人按年龄梯度称呼“大哥”、“大姐”、“大伯”、“大妈”、“大娘”、“大爷”等,以此作为交际活动的开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

(三)零称谓与礼貌用语并行

汉语中缺乏人人乐于使用和接受的通称,而拟亲属称谓也不具有普适性,在经济特区或大城市,使用拟亲属称谓明显低于农村或欠发达地区,认同率相对较低,外国人掌握起来也有相当难度,再说,让与我们文化背景迥异的外国人称呼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为“大哥大姐大爷”,也实在有些尴尬。因此,零称谓也成为无奈之下的选择。在和陌生人打交道时,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不妨以微笑和礼貌用语如“您好”、“请问”作为开场白,也能使交际顺利进行。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汉语中通称缺位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传统的文化伦理、等级观念有着密切联系。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形成了稳定的价值观念系统,人们进行言语交际,都遵从着一定的伦理观念。最近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外来的以及内在的冲击使传统伦理观念发生了巨变,但新型的语言伦理规范尚未形成,在此之前,汉语通称缺位现象将长期存在。

(下转第82页)

[9] 苏轼. 苏轼文集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795

[10] 苏轼. 苏轼诗集·纵笔三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327.

[11] 苏轼. 苏轼诗集·和陶读山海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3327.

[12] 苏轼. 苏轼文集·与王定国书 [M]. 长沙: 岳麓出版社, 2000: 438

[13] 苏辙. 苏辙散文集 [M].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1: 152

[14] 王友胜. 苏诗研究史稿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15] 何文煊. 历代诗话·竹坡诗话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348

[16] 袁行沛. 陶渊明集笺注·和陶归园田居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629.

[17] 吕观仁. 东坡词注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 104

Hearts Which Have a Common Beat are Linked

——SU Shi and 《Poem in reply to Tao》

Zeng An- yuan

(Hunan college of Enviromental- biological polytechnic, Hengyang 421005, China)

Abstract Having experienced many vicissitudes of life and seeing through the fickleness of the world, SU Shi, using themind of the poet, felt and understood the common, unconventional and unrestrained characteristics of TAO Yuan-ming. Also, he, using the language of the poet, explained the thought of TAO Yuan-ming. So, though the time span between them was six hundred years, their mindswere intimately tied up with each other.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life, personality feeling and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features of languages, the author tri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inheritance between TAO and SU.

Key words SU Shi 《Poem in reply to Tao》 inheritance

(上接第 78页)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姚亚平. 现代汉语称谓系统变化的两大基本趋势 [J]. 语言文字应用, 1995(3): 94- 99.

[3] 叶南. 论汉语称谓语的文化内涵 [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1(6).

Exploration on the Phenomena of Present Conventional Appellation Uacancy in Chinese

KUANG La- ying

(Jin 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phenomena of conventional appellation in Chinese and express the relationship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Conventional appellation is a language phenomena which is related to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hierarchy.

Key words conventional appellation, vacancy, zero appellation, pseudo relative appellation